

人民陪审员发挥了解社情民意长于事实认定优势 用群众朴素良知校准司法天平

□ 本报记者 张昊 李娜

平安特稿

□ 本报记者 张昊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参审案件933万件。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了解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直接形式。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法院共有人民陪审员34.1万余人。一大批群众基础好、社会责任感强、参审热情高的公民进入人民陪审员队伍。

人民陪审员了解社情民意、长于事实认定。如何发挥参审优势,用群众的朴素良知校准司法天平,促进定分止争,案结事了?怎样在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发挥专业所长,更加准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朱永红、陈玉两位人民陪审员,了解其履职故事。

沟通桥梁

朱永红现任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老龄协会副秘书长。自2006年起,她在吴中区越溪街道从事妇女儿童保护、文体教育、卫生及科协等民生领域工作,长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十多年前,吴中区人民法院与吴中区妇联共同成立“爱心妈妈团”,结对为未成年人提供关爱帮扶、情绪疏导、心理慰藉。近些年,吴中区法院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爱心妈妈团”又参与到家事调解指导工作中。朱永红也是“爱心妈妈团”的成员。

“有的女性,遭遇家暴后想离婚,却不懂得怎么争取合法权益。有的家庭,因为家庭财产分割,闹得不可开交。如果能对法律有更深的学习,我也能在日常工作中更好地帮助他们。”朱永红说,在过往的工作中,朱永红长期跟踪帮助过失独家庭、遭遇家暴的女性,这些工作让她对群众的困难深有感触,也了解到群众对法律知识的渴求。

2022年7月,朱永红了解到人民陪审员正在开展换届工作,感觉就像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发了芽。

“法律是为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人民陪审员恰恰可以搭建法律与群众生活的桥梁,让两者的‘连接’变得更顺畅。”朱永红说,经过申请和前任培训,2022年8月,她接受吴中区人大常委会任命,成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法官更注重法律适用问题,而人民陪审员则更多从生活常理角度进行判断。”朱永红说,担任人民陪审员后,她在少年、家事案件中深度参与案件办理,通过走访等形式了解当事人的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和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2024年至今2月21日,她参审了各类案件29件。除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案件,她还参审了多起行政案件。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拆迁协议一般由户主签订,拆迁后的安置购房,通常由子女本人签订购房协议,父母一般不会参与签署;而若是父母出资购房,则通常由父母自己签订购房协议,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一起家事案件中,父母与孩子就购房款出资情况各执一词,案件讨论中,朱永红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重视。

者详细介绍,让人能够直观感受到她对研究领域的熟悉与热爱。

陈玉的另一个身份,也是一名人民陪审员。她参审的九门口长城文物保护案被最高法选为第二批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陈玉说,担任人民陪审员,可谓是一场在长城保护工作中的“双向奔赴”。

2022年6月30日,陈玉参加了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长城文化保护法庭的揭牌仪式,进一步感受到长城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在对长城文化的热爱和执着,她申请成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同年10月,陈玉收到了人民陪审员任命书。陈玉参审的九门口长城文物保护案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门口长城的“京东首关”券门墙壁被人用油漆喷涂广告两处,涂污面积约5平方米,喷涂文字已经渗入长城墙体,造成实质损坏。

这起案件专业性较强,开庭前,陈玉到被破坏的券门墙壁处以及附近的村子实地走访调查,并收集相关案例,全面了解证据材料。

“被告喷涂字迹在什么位置,是否影响了这段长城的风貌?”“被告所做擦除字迹的行为,是否使长城墙体恢复了理想的效果?”“你们所做的长城墙体修复工作跟普通建筑修复比起来有何难度?”庭审中,陈玉向出庭的来自长城文物修复单位的证人提出三个问题。

九门口长城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即受到局部的损毁破坏,它的修复难度和要求之高,也绝非普通建筑修复工程可比;必须落实文物保护“原状保护、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等原则;严格依照文物保养维护工程相关规程,工艺进行修复等要点一一展现,原告向法院提出的赔偿金额得到了支持,当事人也消除了“修复费用过高”的疑虑。

“我们参审的九门口长城文物保护案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门口长城的“京东首关”券门墙壁被人用油漆喷涂广告两处,涂污面积约5平方米,喷涂文字已经渗入长城墙体,造成实质损坏。

“我们参审的九门口长城文物保护案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门口长城的“京东首关”券门墙壁被人用油漆喷涂广告两处,涂污面积约5平方米,喷涂文字已经渗入长城墙体,造成实质损坏。

“我们参审的九门口长城文物保护案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门口长城的“京东首关”券门墙壁被人用油漆喷涂广告两处,涂污面积约5平方米,喷涂文字已经渗入长城墙体,造成实质损坏。

保护力量在对长城的司法保护中发挥作用,形成合力。

普法主角

“记得第一次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走进法庭时,感受到庄严的庭审氛围,我整个人都绷紧了弦,仔细倾听庭审中的各方发言,生怕漏掉细节。”朱永红回忆说,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尊重和支持,使她很快适应了人民陪审员的“角色”。

采访中,两位人民陪审员向记者讲述了案件开庭审理之外的点滴。

朱永红说,吴中区法院每年都会为人民陪审员组织集中培训、现场教学等活动。培训内容涵盖政治理论、法律实务、审判纪律和庭审礼仪等多个方面,为陪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法院专门设立了陪审工作办公室,负责提前告知开庭时间并通知陪审员阅卷。承办法官会在庭审前详细介绍案件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根据需要为人民陪审员制作事实认定问题清单。

“庭审前,我会提前到法院查阅卷宗,就基本案情和争议焦点主动与法官和法官助理探讨,对涉及长城保护专业领域的内容进行沟通。”陈玉说,这样更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围绕事实认定问题发问,结合证据材料形成客观判断。

采访中,陈玉和朱永红还提及人民陪审员不仅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普法宣传的“主角”。

“案件审结后,我进一步结合参审经历,深入群众开展法治宣传,营造关心文物保护、支持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陈玉说。

“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我会在日常工作中结合群众需求,将法治精神传播出去。”朱永红说。

漫画/高岳



巢湖边有支特别的小分队 合肥公安做实生态警务守护碧水蓝天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汪佳影

2月以来,大批候鸟陆续飞抵巢湖沿线的湿地和湖泊停歇觅食,包括彩鹇、白鹤、黑嘴鸥等60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种群停留数量是安徽省合肥市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在鸟类栖息的巢湖十八联圩湿地沿岸,也有一道独特风景线——民警、辅警和义警队员组成的小分队,一边开展巡护工作,一边宣传爱鸟护鸟。

“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为了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我们必须履行好执法巡查,严打非法狩猎等职责,守护好辖区生态安全。”经常参与巡护的肥东县公安局撮镇派出所民警李俊说。

近年来,合肥公安机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推进“昆仑2024”专项行动,强化共护、共治、共富“三大生态警务”;组建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分队,成立专门“义警队伍”,与林业等部门及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等建立联动保护机制,并公开报警电话,开通“绿色通道”,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持续以“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突破口,深入研究食药环知森领域犯罪规律趋势,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擎,坚持“以专对专”,聚焦类案研究,建立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违法犯罪数据模型,先后侦破生态环境领域犯罪3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3人。

“我们通过打击非法狩猎数据模型,运算输出线索,再加上市县捆绑作战等机制,去年侦破一起特大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案件,打掉一个流窜全国各地,以猎捕野生候鸟为业的犯罪团伙。”巢湖市公安局食药环知大队大队长周保田说,该案涉案价值3000万元,被公安部列入“昆仑2024”专项行动挂牌督办案件。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近年来,合肥市公安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牵头成立合肥市食药环知联合执法中心,不断促进各领域各部门资源、信息共享,着力实现打击违法犯罪与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等有机融合。

自2020年巢湖湖区实施全域十年禁捕以来,合肥市公安局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联合市场监管、渔政部门完善水域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斩断非法捕捞、运输、销售地下产业链,有效铲除非法捕捞滋生土壤;建立水上勤指中心,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同时配合属地政府整治巢湖水域“三无”船舶,压缩犯罪空间,并配合做好退捕转产渔民服务工作,依法及时疏导化解退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合肥还在全国率先推行“河湖长+排长+警长+检察长+民间河长”的五长治河(湖)模式,全方位推进河湖治理。

和水质一同变好的,还有空气。据了解,2024年,合肥市PM_{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7%,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6.1%,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为助力打好蓝天保卫战,去年8月,合肥市公安局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机动车环境检测数据造假专项治理行动,以联席会议制度推进案件线索会商,针对法律适用、证据规格、造假原理技术论证等方面开展研讨,先后成功侦破多起机动车检测机构弄虚作假案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人,进一步规范了机动车检测市场秩序。坚持案件办理与生态修复同步发力,引导嫌疑人主动履行生态修复义务,联合开展法治宣传,强化“保护生态、损害必偿”理念,不断提高公众在环境保护事业中的参与度。

从修复“邻里情”到巧解“讨薪困局”

平安故事

□ 本报记者 张晨

3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长枫调解室”内,一场因窗户扩建了4公分引发的邻里纠纷正在被化解。

71岁的退休法官刘兰松,西长安街派出所副所长姚晓腾、西长安街司法所所长谭秀云、街道房管所等职能单位工作人员与公益律师邱克围坐在调解桌前以案释法、疏导当事人情绪,厘清法律边界,共商解纷良策。

“窗户扩建你提前跟对方说了没有?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一天不解决,一天心里不舒服。都退一步,少添点堵,本来是小事,可别闹出大事。矛盾升级之后,影响最大的是孩子。”刘兰松一席话,让剑拔弩张的当事人陷入沉思。

这起风波起源于一场发生在胡同平房里的矛盾。朱女士与刘女士两家是邻居,因平房装修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悬挂八卦镜“斗法”。

“谈不拢,就互相摆八卦镜,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我从警十几年,见到的双方互掐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如果窗户扩建之前通过社区警务室提前沟通一下,都不至于发展成现在这样。”姚晓腾劝道,“法理上您亏着呢,情理上就让您一让,不要说得理不饶人的话。闹到最后,赢家也是输家。”

“从前,让他三尺又何妨。现在,见面还是好邻居。”多方

方劝解下,最终双方约定回去后摘掉镜子、加装挡板,握手言和。

“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没想到惊动这么多人。这下简单,买个板子就解决了。”朱女士说。

这场调解不仅平息了矛盾,更让“六尺巷”的传统智慧在现代社区焕发新生。

同日,一面锦旗送到调解室,上面写着“讨薪维权伸正义,警微闪耀耀民心”。这背后,是一场从“救火”到“防火”的跨越。

“我们从去年6月起,陆续接到多起辖区某超市配送员劳动薪资纠纷的警情,30余名配送员因合同层层转包、劳动关系认定模糊陷入讨薪困局。”姚晓腾翻开调解卷宗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双方签订的‘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合同有利于资方,配送员难以通过劳动仲裁等法律渠道解决纠纷。”

2月26日,西长安街街道“吹哨”多部门约谈某超市上级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通报和责令整改。

街道启动“社、室、街、院”四级流转机制,第一时间将辖区某超市与雇员之间的纠纷纳入疑难案件处置流程,由街道主要领导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例会上进行专题调度,组织司法所、民生保障办公室、派出所、消防等多部门成立专班,锁定争议焦点。同时,依托“简单纠纷社区化解、疑难纠纷街道跟踪”机制,制定“约谈整改+联合调解”双轨方案。

姚晓腾厘清矛盾焦点为制式合同违约条款的效力及合同中乙方配送员的知情权;谭秀云平衡情理法安抚双方情绪;邱克发挥专业优势对合同效力、双方事实劳动关

系成立等方面进行专业解读;刘兰松凭借丰富的审判、调解实践经验,综合矛盾焦点,释法说理,给双方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并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

成功调解这起纠纷案件后,各方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持续践行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理念。

司法所对某超市提供相应指导,完善用工管理制度,避免今后再出现同类纠纷,同时向辖区其他商家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提升企业依法用工意识。“长枫调解室”陆续调解成功4起配送员与某配送公司的劳资纠纷,法律专家团在调解成功后对配送公司的合同签订流程、合同内容等作了细致的审核把关,避免再出现此类矛盾。

“长枫调解室”内的墙上有一行字:“长安街上护平安,西绒线里促和谐。”4公分窗户的谦让背后,是情理法的精准平衡;巧解配送员“讨薪困局”,见证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韧性。

矛盾纠纷化解的速度,印证着基层治理的升级。

从家长里短的窗户之争到错综复杂的劳资纠纷,2025年初升级打造的“长枫调解室”成了纠纷终点站。其核心在于一套三级调解机制:简单纠纷社区化解、复杂案件专家介入、疑难问题多部门联动。

“未来,西长安街派出所将用好‘长枫调解室’法律专家团这一机制创新,持续深化‘三所联动’模式,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为辖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西长安街派出所所长李楠说。